

中印互动中被遗忘的篇章：新近发现的泰戈尔画作背后*

张 幸

摘 要：泰戈尔访华重启中印人文交流之路，魏风江作为现代首位赴印度留学的中国学生，于1930年代在印度国际大学学习印度历史和文学并获学位。魏风江在印度的留学经历及其晚年参与的中印交往和文化交流，成为现代中印互动中的重要篇章。我国艺术家丰子恺与泰戈尔之间鲜为人知的艺术联系，正是通过魏风江才得以实现。民间私人收藏中新近发现两幅盖有丰子恺印章的泰戈尔画作，可为此提供佐证。泰戈尔和魏风江在中印交往中做出多方面贡献。

关键词：魏风江 丰子恺 泰戈尔画作 中印互动 中印人文艺术交流

中国与印度的互动交往历史悠久，后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形成较长的停滞期。现代以来，两国的人文交流可以说是由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访华重新开启的。在2024年泰戈尔访华100周年之际，我国再度掀起“泰戈尔热”，民间私人收藏的泰戈尔画作也出现在公众视野。其中有两幅作品上除了有泰戈尔的签名，且罕见地盖有丰子恺（1898—1975）的藏鉴印，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有人推断这两件作品与泰戈尔的中国学生魏风江（1911—2004）有关。笔者曾有幸受邀鉴赏过这批泰戈尔画作藏品，现就画作背后的史料进行发掘梳理，以期回答关于泰戈尔、魏风江、丰子恺三

* 作者系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副教授。

人之间的关联问题，并探讨其在中印互动和人文艺术交流中的作用以及这两幅藏画的现实意义。

一、泰戈尔访华奠定20世纪中印互动的基础

早在1920年，泰戈尔就接到了蔡元培发出的访华邀请，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1922年底，以梁启超、蔡元培为代表的讲学社再次邀请泰戈尔访华，终于促成其1924年4月至5月对中国上海、杭州、南京、北京、武汉等多个城市为期49天的访问，并发表多场演讲。泰戈尔访华重新激发了中国人对印度和印度传统文化的兴趣，引起了人们对印度文学、历史以及中印古老文明之间互动的关注。由他参与和推动的中印跨文化交流互动影响了先后几代中印学者、艺术家、教师和学生，对奠定20世纪中印互动的基础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泰戈尔访华后，东方文学及印度的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等课程在中国高等学府被进一步重视和开设。1924年北大成立东方文学系，1925年清华成立国学院。^①1927年，谭云山受泰戈尔邀请，于次年抵达位于印度西孟加拉地区圣地尼克坦的国际大学（viśva-bhāratī）任教，后担任于1937年在这所大学成立的中国学院（cīnā bhavana）首任院长，当时泰戈尔亲自主持了落成典礼。蔡元培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特别致信泰戈尔：“蒙邀参加典礼，实因年来健康不佳，碍难远涉重洋，赴印访问。已转请谭云山教授师生等，作为我个人及我国人民之代表，参加这一有历史意义的盛典。”^②

1931年谭云山回国时受泰戈尔委托，将拟在两国分别成立致力于发展中印交流组织一事，向国民政府以及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汇报，并获得支持。1933年，蔡元培在南京开始筹划学会成立，并

① 参见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5页。

②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4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54页。此信写于1936年12月。

一直与泰戈尔保持着通信往来。泰戈尔在1934年一封给蔡元培的信中说：“为响应贵国中印学会之成立，此地亦正筹组印中中学会。我甚愿以自己狭小的园地，栽培参天的大树，把圣地尼克坦国际大学办成中印文化交流的中心地。”^①1934年5月，印度的印中中学会（Sino-Indian Cultural Society）在印度国际大学成立，泰戈尔任主席，次年5月，中国的中印学会在南京成立，由蔡元培担任理事会主席。印中中学会和中印学会吸纳了两国教育、文化等领域的精英和相关政要，也得到两国政府的支持。

泰戈尔对发挥学会在两国间的作用十分重视，他在给蔡元培的一封信中说：“我向您保证，我将尽最大努力促进印中中学会在我国的利益，因为我确实将其视为中印文化关系中的一条重要纽带。”^②蔡元培与泰戈尔的共同心愿是尽快开展中印间的学者交流、教师互聘和留学生互派。1933年，魏风江经谭云山推荐，蔡元培批准，赴印度国际大学留学，成为现代第一位到印度留学攻读学位的中国学生。^③印中中学会和中印学会的成立以及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的创建，使中印文化交流自此有了统一的组织机构和教学场所；谭云山与魏风江分别在印度国际大学的任教和留学，开启了现代中印学者互访和互派教师、留学生的交流新进程。

①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4卷，第23页。此处翻译的落款日期为1935年9月28日，根据蔡元培的回信日期1935年2月6日，推测此信应写于1934年。

② 泰戈尔信的英文原文为：“I assure you that I shall do my best to further the interests of the Society in my country for I really look upon it as a great bond in the cul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India.”该信笺来自蔡元培家人收藏，在此特别感谢蔡磊博士的慷慨分享。

③ 在泰戈尔访华后，曾圣提（原名曾楚侨）于1925年赴印度国际大学求学，停留时间较短，可算作第一位赴印度短访的中国学生。后在甘地的真理学院任职，“圣提”一名为甘地所取，为梵语词“和平（śānti）”的音译。1926年回国。可参见：Anirban Ghosh, “Gandhi in Pre-1947 Chinese Writing”, in Swaran Singh and Reena Marwaf eds., *Revisiting Gandhi: Legacies for World Peace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London: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21), pp.227-228.

二、中印互动的友好使者魏风江

魏风江于1911年出生在浙江萧山。中学时期他就读于上海春晖中学和立达学园，师从先后在这两所学校任教的丰子恺，并学习了英语和法语。他在读中学时就阅读过泰戈尔的作品，对印度产生了兴趣。1931年谭云山从印度回国后曾任教于立达学园，十分欣赏这位勤奋好学的学生，常将其带回校园旁的家中，后来谭云山夫妇还让他在自己家中的亭子间住过一段时间。^①这就不难解释在1933年中印学会筹备中计划互派学生之时，魏风江便成为被谭云山推荐的第一位派往印度的中国留学生。

魏风江于1933年底乘船抵达加尔各答，来到国际大学后受到泰戈尔的亲切接见，泰戈尔对他说：“中印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这个关系的继续发展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你是第一只从你祖国飞来的幼燕，欢迎你筑巢在圣地尼克坦，同我们一起生活和学习吧。”^②作为泰戈尔唯一的中国学生，魏风江在国际大学主修印度历史与文学，不仅师从泰戈尔，还选修了印度哲学和历史课程。为更好地融入当地的生活，他还学习了孟加拉语和泰戈尔歌曲，甚至带上脚铃跳过印度舞蹈。^③泰戈尔一直对这位中国学生关爱有加。

1934年，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访问圣地尼克坦，他在欢迎人群中看到魏风江时亲切地说：“你很像印度人啦，一时还看不出你是一个中国学生。你到圣地尼克坦来读书，我们很高兴。我们盼望有更多的中国学生来印度读书，也希望有印度的学生去

① 参见魏风江《印度重访记》，《南亚研究》1988年第1期，第71—72页。2024年7月10日，谭云山长子谭中先生在与笔者通话时回忆起魏风江与其全家交往甚密，他还特别提及1930年代在上海时魏风江曾在他们家生活过一段时间，住在楼梯旁的隔间中，即为魏风江所述的“亭子间”。

② 魏风江：《我的老师泰戈尔》，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页。

③ 任鸣皋：《中印文化交流和友好合作的桥梁——记魏风江教授》，《南亚研究》2004年第1期，第81页。

中国读书。”^①为支持泰戈尔的办学事业，尼赫鲁将女儿英迪拉·尼赫鲁（Indira Nehru）转入国际大学学习。1934年下半年开始，英迪拉成为了魏风江的同班同学，她受父亲影响对中国文化也感兴趣，向魏风江学习过汉字，并尝试用汉字拼写自己的名字。虽在一学年后因家中变故离开了学校，1937年4月14日国际大学的中国学院成立时，她又回到校园，替因病无法出席的父亲宣读贺信。

中国学院成立时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也发来贺电：“愿中国学院作为印中两国人民结合的象征，产生丰硕的果实。”魏风江随后被泰戈尔派往华尔达（Wardha）拜访甘地，并在甘地创办的真理学院（sevāgrām āśrama）学习。初次见面时甘地就对他说道：“你们中国青年热情、勇敢，我爱中国，我爱中国人民……你可以在这儿学习，不要急着走。”^②魏风江于1937年4月22日至9月28日在真理学院学习，并参与讨论甘地当时正在进行的语言改革。他向甘地夫人学习用手纺车（cakra）纺纱，参加了当时甘地在农村的深入考察，还两次面见到访的尼赫鲁。1937年7月中国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后，甘地鼓励这位年轻的中国学生“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同年9月魏风江决定返回国际大学结束学业，临别前甘地为他书写赠言：“我向来喜爱中国青年，他们在艰难岁月中勇往直前，我深信他们定将成功，因为他们品德高尚。”^③甘地还将魏风江经常用的手纺车赠予他留念。

魏风江1937年本科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后，因抗战形势严峻，未能及时返回国内，仍继续在国际大学学习。虽有资料显示他曾获硕士学位，并被聘为中国学院副教授^④，但根据对国际大学教学历史的考证，

① 文楚：《魏风江：尼赫鲁家族的中国友人》，《纵横》1999年第4期，第27页。

② 魏风江：《与甘地相处的日子》，《人民日报》1993年9月11日第七版。

③ 此处所引为魏风江的译文，见魏风江《与甘地相处的日子》，《人民日报》1993年9月11日第七版。原文为“My affection has always been with the youth of China, in the difficult years they are passing through. I am sure that they will come through successfully, owing to their moral character.”参见魏风江《我的老师泰戈尔》，第157页。

④ [印度]阿维吉特·巴勒吉：《魏风江——中印友好关系的先驱者》，陈萍译，《南亚研究季刊》2006年第4期，第121页。

当时并无硕士学位授予点，中国学院当年也未设副教授一职。^①然而，一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能在印度留学期间师从泰戈尔与甘地，并与尼赫鲁等多位政要接触交流，也仅此一人，十分难得。

1939年1月，魏风江从加尔各答辗转香港回国，后被聘为浙江省政府外事秘书。同年3月，周恩来到金华视察并作关于国际形势和抗战工作的报告，在报告后的会见中周恩来对魏风江说：“你在印度留学五六年，必有广大师友，所以要在沟通中印文化，增进中印人民友好方面做更多工作。”^②这使魏风江备受鼓舞，刚从印度学成归国的他一心想用自己所学为中印关系发展做出贡献，无奈受限于当时动荡的政局，虽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但并没机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之后近半个世纪的人生道路上魏风江命运多舛，但他始终积极投身教育工作，先后任教于上海、浙江的多所学校，常在课堂中为学生讲述泰戈尔。改革开放后他得到了时任总书记胡耀邦的关怀和亲笔批示，改善了住房和政治待遇。1981年，他在绍兴越秀外国语学校任首任校长并讲授英语课程。他曾担任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省人民对外友协理事、中国南亚学会顾问等职务。1986年出版了《我的老师泰戈尔》一书，还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翻译印度文化和艺术的相关条目，并经常在学术期刊和报纸杂志上发表关于中印交流的文章。^③

魏风江曾于1987年和1997年两次应邀访问印度，其中1987年的访问对中印恢复邦交正常化曾起到积极作用。当年4月，魏风江受他昔日同学英迪拉的儿子、时任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和印度驻中国大使的邀请访问印度。他逐一前往泰戈尔、甘地、尼赫鲁和同学英迪拉的墓前谒奠，追忆往昔，还拜访了曾经的师友及其家庭，并受到总理

① 关于印度国际大学的历史可参见Swati Ganguly, *Tagore's University: A History of Visva-Bharati, 1921-1961* (Ranikhet: Permanent Black, 2022)。

② 应民：《德泽春风满心田——泰戈尔的弟子受重托》，《党史纵横》1997年第1期，第7页。

③ 参见任鸣皋《中印文化交流和友好合作的桥梁——记魏风江教授》，《南亚研究》2004年第1期，第83页。

拉吉夫·甘地的接见，引起印度各界广泛关注。魏风江对拉吉夫·甘地发出回访邀请，这对中印边境冲突后的首次印度总理访华在次年实现起到了促进作用。^①拉吉夫·甘地于1988年对中国进行了近一周的访问，魏风江在北京参与会见。

魏风江一生致力于中印友谊，出于对恩师泰戈尔和自己留学生涯的怀念，他在自己家中特别布置了一间泰戈尔纪念室。印度多位领导人及驻华大使都曾与魏风江有过见面或通信交往，其中包括印度总统文卡塔拉曼（Ramaswamy Venkataraman）、纳拉亚南（Kocheril Raman Narayanan），印度总理拉奥（Pamulaparthi Venkata Narasimha Rao）、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等。^②2004年魏风江走完93岁的坎坷一生逝于杭州。他的墓碑显得与众不同，其上除了遗像和他的座右铭，还镌刻着影响他一生的老师泰戈尔的肖像和诗句。

三、丰子恺与泰戈尔——中印艺术家 超越时空的联系

如前文所述，在赴印度求学之前，魏风江已在上海春晖中学和立达学园与丰子恺有师生之谊，曾师从丰子恺学习绘画和音乐。当时立达学园的校徽就是由丰子恺设计的。丰子恺在文化艺术多方面都颇有成就，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绘画作品，是现代中国漫画形式的开创者，还创作了大量文学、书法、音乐作品，同时也是一位艺术教育家，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率先将西方美术史和现代美术思潮引入中国的艺术教育，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而泰戈尔不仅是一位诗人、文学家，也是一位艺术家。他一直对

① 魏风江在交谈时表示，希望拉吉夫·甘地总理能到中国去访问。拉·甘地说：“我想去中国访问，要是去了，那么你就是第一个邀请我的人。”参见文楚《魏风江：尼赫鲁家族的中国友人》，《纵横》1999年第4期，第31页。

② 参见李乍虹《超越半个世纪的友谊：一位萧山籍老人与印度领袖的故事》，《今日浙江》2000年第3、4期，第71页。

绘画有着浓厚的兴趣，泰戈尔的绘画创作既不属于当代的任何流派，也不属于对传统的单一继承，不论是创作风格还是内容，都只能归于“泰戈尔派”，有其独特之处。他晚年创作了数千幅绘画作品并多次办过画展。在访问中国后，他对中国的绘画与艺术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与魏风江初次会面时，泰戈尔就回忆起他对西泠印社的访问，提及“在社里见到多幅布局宏伟、笔力雄健的山水画和缜密富丽、栩栩如生的花鸟画”，评价那都是非常成功的作品。并对中国的书法赞赏有加，认为“把字作为艺术品是中国特有的，即使是不识中国字的外国人，也能领会到一直一横的挺秀和矫健”，还提到金石刻印“是中国所特有的艺术品”。泰戈尔高度评价中国的艺术，说“中国人都爱好艺术。普通人家用的盘盘碗碗上都有美丽的图画，桌椅床柜上无不有着精美的雕刻，件件日用品都是艺术品，可以说中国是一个艺术的国家”。^①

魏风江在印度求学期间，可以收到从中国寄去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和《小说世界》等杂志，其中《小说月报》和《小说世界》上经常有丰子恺的漫画作品。他把自己昔日老师的画拿给泰戈尔看，并与他就绘画创作进行讨论。一次泰戈尔在仔细欣赏了魏风江从杂志上剪下并赠予他的丰子恺作品后说：“你们中国的书法也是一种艺术，这位画家，把书法的艺术应用在绘画上了。”魏风江告诉泰戈尔：“丰先生的画，都有一句诗词，作为题旨，如‘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等等。”泰戈尔说：“这是诗与画的具体结合，也是一种创造。”还进一步评论：“艺术的描写不必详细，只要得到事物的精神即可。你的老师这几幅画，就是用寥寥的几笔写出人物的个性。脸上没有眼睛，我们可以看出他在看什么；没有耳朵，可以看出他在听什么，高度艺术所表现的境地，就是这样！”^②丰子恺创作过不止一幅题旨为“月上柳梢头”的作品，此处提及的应为1925年创

① 魏风江：《我的老师泰戈尔》，第28—30页。

② 同上书，第118—119页。亦参见苏迟《丰子恺与泰戈尔》，《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第115页。

作的一幅，画面中除了圆月、柳枝、栅栏，还有一位穿着格纹衣服的长发女子的背影。也确实如泰戈尔所说，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符合柳下美人构图范式的画作。

根据魏风江的描述，他曾将泰戈尔的两幅画作寄给丰子恺，其中一幅是一个披头散发的妇女的脸庞，合着双手祈祷；另一幅是一位女子站在窗前抬起头，向多云的天空凝视着。丰子恺在回信中说：“寄来泰戈尔的画，第一幅的题意是‘忧郁’，第二幅是‘怅惘’。印度妇女在封建制度、宗教戒规和外来压迫下，过着悲惨的生活已经千百年了，泰戈尔是第一个人把印度妇女抑郁的形象用绘画表现出来了。”^①

泰戈尔的绘画作品中有不少对女性肖像的表现，泰戈尔认为只有妇女获得解放才能有印度的解放，他的文学作品中也有关于女性不同命运的描述。丰子恺能准确捕捉到泰戈尔画作中蕴含的思想表达是很难得的。这也正反映出艺术无国界，两位艺术家心灵相通，对彼此画作的欣赏与理解，是可以跨越国籍与距离障碍的。也正如丰子恺在1929年全国美展刊作的文章所述：“真的美术的绘画，其本质是‘美’的。美是感情的，不是知识的；是欣赏的，不是实用的。所以画家但求表现其在人生自然中所发见的美，不是教人一种知识；看画的人，也只要用感情去欣赏其美，不可用知识去探究其实用。真的绘画，除了表现与欣赏之外，没有别的实际的目的。”^②

丰子恺与泰戈尔虽从未见过面，二人的画作却通过他们共同的学生魏风江介绍给对方，并彼此相互欣赏，这无疑是在这两位中印艺术家之间超越时空的特殊艺术联系。作为丰子恺和泰戈尔的学生，魏风江一直努力尽己之力把这两位不同国度的艺术家联系起来。这不仅因为丰子恺和泰戈尔同时在绘画、音乐和文学方面的兴趣和取得的巨大成就，他们在教育思想和理念上也有许多共同点。在魏风江看来，“这种联系，由一个他们俩共同宠爱的学生来牵线是最适宜的了。”虽然魏风

① 魏风江：《我的老师泰戈尔》，第119页。

② 丰子恺：《绘画之用》，《丰子恺散文漫画精选》，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第174—175页。

江遗憾地表示“他们两人除了互相欣赏，互相赞佩之外，再没有进一步的交往。这是由于我的才学不足以负起这样的重任，是对不起两位老师的。”^①而实际上，能在当时促成中印两国艺术大家之间这种没有直接接触却能互相理解和欣赏的微妙联系，已是十分难能可贵了。这也是中印艺术交流史上一段值得被提及的插曲。

四、新近发现的两幅泰戈尔画作 ——传递的信息和引发的探讨

在迎来泰戈尔访华百年之际，国内一位私人收藏家所藏的泰戈尔画作引起学术界关注。私人购置并收藏泰戈尔画作在国内尚属罕见，这些画作被认为与魏风江有联系，但尚缺少确凿证据资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两幅均为36厘米×26厘米，且背面盖有丰子恺印章的泰戈尔画作，印章样式为丰子恺藏鉴印。

这两幅有泰戈尔署名的作品均为女性人物肖像画，其中一幅（图1）颜色较暗，为黑底上两位女性肖像，左侧人物稍大，为侧脸；右侧人物稍小，似在远处，为正脸。左侧长发女子露出右边脸庞和右眼，头发遮盖了左边部分面庞，右手臂上抬，右手似在整理左面颊边垂发；而右侧女子为大半身正面像，略显潦草，双眼与左侧女子看向同一方向，也是长发，右手似拂在下颌处。画作上泰戈尔的签名均为竖签，位于画的右下方。另一幅（图2）则是一位面色平静的长发女子的正面肖像画，浅棕的底色衬托出用黑色画笔勾勒出的画中人鲜明的五官，无论是构图还是用色都与泰戈尔的一幅常作为代表作在画展中展出的女性肖像画十分相似；不同之处在于人物表情和头发样式，画展中常出现的肖像画中的女子面带微笑，浓密的长发搭在左侧肩上，而这幅

^① 魏风江：《我的老师泰戈尔》，第118—119页。

画中的女子并无笑意，长发从右肩垂下。^①这幅画上的泰戈尔签名为横签，位于画的左下方。在这两幅画上，丰子恺的红色藏鉴印均盖在画的背面右下角。



图1



图2

这两幅藏画虽都是女性肖像，但画上既没有表现合起双手祈祷的妇女，也没有出现抬头站立在窗前的女子和多云的天空。因此，显然并不是前文提及的由魏风江寄给丰子恺，并被其在回信中评论为“忧郁”和“怅惘”的那两幅泰戈尔画作。至于魏风江是否曾将泰戈尔的其他画作寄给过丰子恺，目前可查到的资料中并未发现相关信息，丰子恺的家人对其曾经收藏的泰戈尔画作情况也并不了解。魏风江在著述中曾描述，1939年离开国际大学回国时，泰戈尔的秘书钱达（Anil Kumar Chanda）先生来车站送行，并转交了泰戈尔赠予的十幅画作、

① 此处提到的在画展中展出过的泰戈尔女性肖像代表作也出现在纪念泰戈尔诞辰150周年时印度文化部主办的泰戈尔巡回画展所出版的画册封面，见：R. Siva Kumar ed., *Last Harvest: Paintings of Rabindranath Tagore* (Calcutta: Grantha Corporation, 2011)，原作现藏于印度圣地尼克坦。

两本诗集和几本文集，祝他一路平安。^①这些画中是否包含了这两幅新近发现的有丰子恺印章的画作不得而知，丰子恺的藏鉴印在何时何地也被盖上也成了未解之谜，希望将来能发现更多线索可供探究。虽然这两幅画作以及上面的签名还有待进一步专业鉴定，但在国内发现泰戈尔画作收藏本身所反映出的中国收藏家对泰戈尔绘画的兴趣已值得予以关注。

魏风江的著述中有他将泰戈尔的画作寄给丰子恺并得到回复的记述，遗憾的是，在已出版的丰子恺日记和信笺中，并未找到魏风江所描述的丰子恺寄给当时在印度的魏风江的回信，其他资料中也未发现关于丰子恺所藏泰戈尔画作的记载。在已出版的《丰子恺文集》中，有两封信是丰子恺写给魏风江的，分别写于1971年和1972年，其中一封恰好提及泰戈尔：

风江仁弟：

来示欣悉。知近况安善，至深喜慰。吾弟亦已近于退休年龄，无怪我等之垂垂向老也。仆今七十五岁，两年来患肺病，幸有良医良药，现已入吸收好转期，近正在家休养也。叨天之福，老而弥健，茶甘饭软，酒美烟香，不知死之将至也。所示诗，第二句应改为“诗学泰翁大道高”，因道字仄声，不能与毛字押韵也。附赠画一幅，留念。即问

近佳

子恺 手启

壬子长至〔1972年6月21日，上海〕^②

从信的内容看，应该是此前魏风江向丰子恺请教一首用中文创作

① 魏风江：《我的老师泰戈尔》，第177页。

② 丰子恺：《丰子恺文集》第7卷“文学卷3”，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706页。

的关于泰戈爾的诗作，丰子恺回信提出对第二句的修改意见，还附赠画作留念，可见二人深厚的师生情谊维系了近半个世纪。三年后丰子恺辞世，这封信或许是魏风江最后一次同他的中国老师讨论与他的印度老师相关的内容，并得到积极的反馈。

1941年，印度国际文化学院（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创始人、著名梵语学者和政治家罗怙毗罗（Raghu Vira）得到丰子恺的诗画集《护生画集》和《续护生画集》，他将《护生画集》中的汉语诗文翻译为英语，甘地看到后惊叹于其中表现出的护生与非暴力思想，并鼓励他将其出版。^①1954年，由罗怙毗罗翻译的《护生画集》汉英梵三语对照版本终于在印度出版，次年再版，英文标题定为《中国诗画中的护生思想》（*Chinese Poems and Pictures on Ahimsā*）。此书出版后在印度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不仅是对丰子恺诗画作品的成功译介，更是让中国护生思想在印度和西方得到认识与推广。

泰戈爾曾鼓励印度国际大学的学生来中国向丰子恺学习绘画，罗怙毗罗的儿子世主月（Lokesh Chandra）在国际大学学习后也来到中国向丰子恺学画。^②1981年，他将父亲未译的《续护生画集》译为英语，标题定为《护生思想在中国》（*Vibrations of Ahimsā in China*）。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他也提及魏风江与英迪拉·甘地的同学关系以及与丰子恺的师生情谊。^③1987年魏风江重返印度时在新德里与世主月见面，他在回国后发表的文章中这样记述：“艺术家中有一位叫洛克什·钱德拉，是当年国际大学的一个小同学，现年74岁，他曾来我国师事丰子

① Raghu Vira, *Chinese Poems and Pictures on Ahimsā* (New Delhi: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1954), p.1.《护生画集》是以仁爱护生为主体的诗画集，共有六集，创作时间从1927一直持续至1973年，在佛教、艺术等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并有多种译本出版。其中第一集《护生画集》和第二集《续护生画集》分别于1929年2月和1940年11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均由丰子恺作画，弘一法师题写诗文。

② 梦之仪：《风风雨雨忆前尘——“文革”中的丰子恺》，《江南》2008年第1期，转引自梦之仪《纸上光阴：民国文人研究》，台北：秀威资讯有限公司，2013年，第199—238页。

③ Lokesh Chandra, *Vibrations of Ahimsā in China* (New Delhi: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1981), pp.1-2.

恺先生。丰先生又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们应该有双重的同学之谊了。他除了送我很多张泰戈尔和南达拉尔·鲍斯等人的画片以外，还送我一大本由他翻译的丰子恺先生的《护生画集》（画集的每幅画有诗及说明）。”^①

这条由魏凤江连接起的中印间艺术交往的特殊纽带，在他的两位老师去世后仍在以不同形式延续。值得一提的是，《护生画集》与《续护生画集》是丰子恺与对他在音乐、美术、文学等领域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老师弘一法师共同商定合作完成的。^②而后这些作品又由丰子恺的学生翻译并介绍给印度读者，进一步体现了中印之间跨越时空的师生情谊。

五、结语

泰戈尔访华对重启中印交往通道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其中也包括了推动和促进现代中印艺术家互动、绘画交流等。在泰戈尔访华后，1927年高剑父就曾致信泰戈尔邀请他主持东方国际美术协会；1939年，徐悲鸿应泰戈尔的邀请赴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讲学并开办画展；1945年常任侠、徐梵澄赴国际大学讲学，讲授中国历史、考古与美术史相关课程；1946年释晓云抵达印度考察，后在国际大学讲学并在加尔各答举办画展；1947年常秀峰赴国际大学留学，师从“孟加拉画派”代表画家、国际大学美术学院南达拉尔·鲍斯（Nandalal Bose）教授。与此同时，1947年印度政府选派苏可拉（Yagneshwar Kalyanji Shukla）、周德立（Nihar Ranjan Chowdhury）和欧辨才（Jaya

① 魏凤江：《印度重访记》，《南亚研究》1987年第2期，第66页。“洛克什·钱德拉”即世主月名字之音译。

② 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丰子恺于1914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5年师从李叔同学习图画、音乐，在李叔同的指点下，确定了一生艺术之事业。参见丰子恺《丰子恺自述：我这一生》，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第357页。

Appasamy)三位印度学生来华留学,在国立北平艺专学习中国绘画。^①这些都成为中印现代艺术交流史上的佳话。

现代中印互动交往和人文交流包含绘画作品在内的物品流动与文化接触,这亦是中印关系纽带中不可或缺的一方面。泰戈尔当年创办并亲自担任校长的圣地尼克坦印度国际大学的校训是用梵语写的“全世界相会于一个鸟巢”(yatra viśvam bhavatyekanīdam),其办学理念就是让这所大学成为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汇点,让东西方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这无论是在中印间互派留学生还是中印艺术家的交往中,都发挥了积极推动的作用。

作为现代第一位赴印度留学并获得学位的中国学生,魏风江在印度学习生活期间不仅与泰戈尔结下师生情谊,还结识了尼赫鲁父女并亲聆甘地教诲。他的留学经历及其晚年以不同形式参与的中印交往和 文化交流,成为现代中印互动中的重要篇章。泰戈尔和他的学生魏风江在20世纪中印两国互动和人文交流中做出了多方面贡献。而新近在民间私人收藏中发现的两幅盖有丰子恺藏鉴印的泰戈尔画作背后,展现了一段通过魏风江才得以实现的中印两国艺术家之间鲜为人知的艺术联系。泰戈尔和丰子恺这种并无直接接触的联系与交流,是中印交往中一个未得到充分研究的插曲,而魏风江在其中的作用和贡献也值得更多关注。

虽然这两幅有泰戈尔署名的画作还有待进一步鉴定与研究,但值得我们重新回顾泰戈尔和丰子恺这两位艺术大家之间曾经有过的友谊和交往。他们赞美和欣赏对方的画作,鼓励自己的学生向对方学习,体现出两位艺术家“美人之美”的高尚品格。这也与魏风江实践泰戈尔的理想,努力促进包括艺术家在内的中印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正如1952年印度艺术展览在中国举办之际丰子恺撰文祝贺时所言:“中印两国的人民,将因文化艺术的交流而更深地互相了

^① 关于这三位印度画家在中国学习经历的研究,可参见陈明《北平学艺:重构三位印度青年画家》,《美术研究》2023年第3期。

解；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将因文化艺术的交流而更加增进，这是很可庆幸的事！”^①100年前泰戈尔访华时曾说：“如果通过这次访问，中国接近了印度，印度也接近了中国——不是为了政治的或者商业的目的，而是为了毫无功利性的人类之爱，除此之外，别无他求，那么，我将会感到很荣幸。”^②他的希冀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文明互鉴与文化交融是当下全球化时代人们的共同愿望。

① 丰子恺：《印度艺术展览介绍》，《弘化月刊》第8卷总第133期，1952年6月，转引自《丰子恺全集·艺术理论艺术杂著卷四》，北京：海豚出版社，2016年，第288页。

② Rabindranath Tagore, *Talks in China* (Santiniketan: Visva-Bharati, 1925), p.50.